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期

目 錄

高山族研究回顧與前瞻座談會

導言.....	李亦園
日本學人之高山族研究.....	劉斌雄
光復後高山族的社會人類學研究.....	陳其南
臺灣土著語言的研究資料與問題.....	李壬癸
光復後高山族的經濟變遷.....	黃應貴
山地行政與山地政策.....	郭秀岩
高山族研究回顧與前瞻座談會綜合討論紀錄.....	李亦園等
建和村卑南族的社會變遷.....	石 磊
埔里盆地稻蔗雙作農村勞力之鳩集.....	謝繼昌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秋季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出版)

臺北・南港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期

目 錄

高山族研究回顧與前瞻座談會

導言.....	李亦園	1
日本學人之高山族研究.....	劉斌雄	5
光復後高山族的社會人類學研究.....	陳其南	19
臺灣土著語言的研究資料與問題.....	李壬癸	51
光復後高山族的經濟變遷.....	黃應貴	85
山地行政與山地政策.....	郭秀岩	97
高山族研究回顧與前瞻座談會綜合討論紀錄.....	李亦園等	107
建和村卑南族的社會變遷.....	石 磊	119
埔里盆地稻蔗雙作農村勞力之鳩集.....	謝繼昌	143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秋季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出版)

臺北 • 南 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期

(翻印、轉載、翻譯，需徵得本刊同意)

本刊年出兩期，全年國內新臺幣一百元，國外美金六元（郵費在內）。零售每本新臺幣五十元。

Published semi-annually. Foreign subscription: US\$ 6.00 a year.

編輯者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印刷者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沙街二段71號

代售處 三民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55號

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50號

東豐書店
東京都澁谷區代代木1丁目35番1號
代代木會館ビル3階 電話 (370) 6766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秋季

高山族研究回顧與前瞻座談會

導 言

李 亦 園

民國六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日，民族學研究所舉行了一次“臺灣高山族研究回顧與前瞻座談會”，此一座談會在一方面有它本身實質上的成果，這可以從下面六篇論文及報告看出來，但在另一方面，它也象徵着民族學研究所在高山族研究上一新時期的開始。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成立於民國四十四年，在成立當時最主要的研究目標即是從事臺灣高山族文化的調查研究；在民族學研究所成立後的第一個十年期中，高山族研究的工作確極為活躍，這可以從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一期至第二十期所發表的論文性質看出來：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一期（民國四十五年春季）至第二十期（民國五十四年秋季），計刊有論文一百二十一篇，其中有關高山族之研究者共五十六篇，幾乎佔總數的二分之一，這一情況是非常明顯的。但民族學研究所研究的趨勢，在第二個十年開始以後已有了轉變，高山族的研究已大為減少，至少已經不是最主要的研究目標，這種情形也可從發表於集刊上的論文看出來。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廿一期（民國五十五年春季）至第卅九期（民國六十四年春季），共刊有論文一百五十七篇，其中有關高山族研究者共二十七篇，僅佔總數的六分之一而已。

民族學研究所在第二個十年期中之所以對高山族的研究逐漸減弱，一方面是由於自然的趨勢，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研究策略上的有意安排。在研究趨勢上，這一時期中漢人社會文化及其變遷的研究，以及東南亞華僑社會的研究已成為很受注意的項目，所以很自然地將高山族研究的力量分散了。在研究策略上，則高山族原有的社會文化正處於急劇的變遷之中，要研究急劇變遷的社會文化自然不能完全依靠傳統的民族誌方法，而必需尋求理論上、方法上，甚至目標上的新途徑，就在這理論上、方法上與目標上尋求新途徑的過程中，勢必與過去的傳統有所疏隔，所以在過去數年中，高山族的研究確是相當沉寂，但是這種沉寂並不代表消失，在沉寂之中新的趨勢正在形成，而“高山族研究回顧與前瞻座談會”正是為了新的研究趨勢而舉行，代表着民族學研究所在第三個十年期中，高山族研究將重新出現而成為主要研究目標之一。

“高山族研究回顧與前瞻座談會”於六十三年八月廿六日至九月二日的一週間，每

日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在本所會議室舉行，前後共有五次專題討論及一次結束綜合討論。每一次專論均由一位或二位研究者作專題報告，同時也約定二位至三位“主要討論者”提出意見，然後再由與會者自由討論。茲將討論日程表及主講人、約定討論者列於下表：

日 期	討 論 主 題	主 講 人	約定討論者
八月廿六日 (星期一)	日本學者之高山族研究	劉斌雄先生 (本所專任研究員)	陳奇祿 王崧興先生 劉枝萬
八月廿七日 (星期二)	光復後我國學者之高山族研究	陳其南先生 (本所助理研究員)	劉斌雄 石 磊先生 施振民
八月廿八日 (星期三)	(一)高山族語文問題 (二)高山族的經濟變遷	李壬癸先生 (史語所副研究員) 黃應貴先生 (本所助理研究員)	丁邦新先生 徐正光先生
八月廿九日 (星期四)	基督教對高山族文化的影響	練馬可 (Mark Thelin) 先生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李亦園先生 丘其謙
八月卅日 (星期五)	山地行政與山地政策	郭秀岩先生 (臺灣省民政廳山地科長)	文崇一先生 石 磊
九月二日 (星期一)	綜合討論	李亦園先生 (本所研究員兼所長)	全體與會人員

在對討論專題及主講人的安排上，已經顯露出我們對研究新趨勢的着重情形。在討論專題上，除去對日本時代及光復後的研究分別作評論外，尚有下列四專題：(一)高山族語文問題，討論重點除去高山族語言學研究問題外，同時也以客觀立場來討論山地語言傳承以及作為教學媒介的問題；(二)高山族的經濟變遷，在此專題下廣泛涉及高山族對現代經濟制度的調適問題；(三)基督教對高山族文化的影響，這一專題的擬定是鑑於基督教及天主教在高山族中極為普遍，其影響於高山族社會文化如何，無論站在主觀或客觀的立場上，都應該給予一適當的估評；(四)山地行政與山地政策，這一專題的設計正代表在理論研究之外，實用的問題將受到更多的重視。

在主講人方面，由劉斌雄先生擔任對日本學者研究的評價可以說是最合適的，劉先生是本所專任研究員，對日本學者的研究有長久的體認，同時在前幾年曾在京都大學訪問研究一年，與日本學者有親身的接觸。其次特別要說明的是安排陳其南先生對光復後研究情況作評論一事，陳其南先生是臺大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畢業生，現任本所助理研究員，他可以說是我國人類學界的“第三代”。安排一個“第三代”來對在場的前二代的人作估評，也許有不能暢所欲言的缺點（事實上陳先生已儘量避去這缺點），但是也有其優點，這就是代表一種朝向將來的取向與決心。關於高山族語文問題，邀請李壬癸先生主講，也是很好的人選，因為李先生受過嚴格的語言學訓練，目前正從事高山族語言

及其他南島語的實地研究。安排黃應貴先生主講高山族經濟變遷，也與陳其南先生具同樣理由，因為黃先生也是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畢業，也擔任本所助理研究員，同是中國人類學的第三代。邀約練馬可（Mark Thelin）教授來主講基督教的影響，並非完全由於他是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同時也由於他是基督教會的重要人士，對教會的政策甚為瞭解，所以他一方面知道學術界的需要，並且也能代表教會發表意見。最後，但是也是最值得重視的是臺灣省政府民政廳郭秀岩科長的來所報告山地政策與山地行政這一專題，這可以說是行政與學術結合最好的例子。

在六天的討論會中，所內及所外參加的人都相當踴躍，前後與會者名單列如下：

本所參加人員：劉斌雄、文崇一、陳奇祿、王崧興、劉枝萬、石磊、喬健、施振民、陳照媛、黃應貴、鄭美能、陳其南、許嘉明、陳祥水、謝繼昌、徐正光、瞿海源、呂玉瑕、朱維蘋、白瑞德、任紹廷及李亦園。

院內及院外來賓有：芮逸夫、劉衍、何堯助、管東貴、丁邦新、李壬癸、丘其謙、阮昌銳、王端宜、柯環月、練馬可、郭秀岩。

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同學：余光弘、張恭啓、簡正亮、蔣鴻榮、林明美、呂萍、黃道琳、何翠萍、宋和、葉春榮、葉蓉、錢琪、范儒、李咨吟、宋光宇、高秀枝、王道還、于嘉雲、陳宏彥。

在討論會進行中，與會人員發言甚為熱烈，提供甚多寶貴意見，這些意見都經錄音，並由本所陳照媛小姐整理出來。每一專題的討論紀錄，整理後都送各個專題報告人參考，他們並大部份歸納到最後寫成的稿本裏，所以這些紀錄就不再分別發表，只有最後的綜合討論，因自成一單位，經整理成篇，即附在各專題報告之後發表於此。

在本期集刊中，除去本文及綜合討論紀錄之外，共有五篇專題報告，包括劉斌雄、陳其南、李壬癸、黃應貴及郭秀岩五位先生的稿件，前四篇都是討論後再重加整理而成的，並且都附有詳細的書目，我們對他們的辛勞感謝萬分，我們同時也要對所有參加討論會的同仁來賓及同學致至誠的謝意。還有一點使我們感到遺憾的是練馬可教授的講稿未能及時送到一併付印，我們在這一年中一直希望練教授能依約把講稿從美國寄到，但是練教授或因工作太忙，都未有回音，我們因恐全部講稿及紀錄失去時效，所以不得已先發表了，但總覺得少了練教授的大作是一個美中不足！

日本學人之高山族研究

劉 斌 雄

首先，作者選出日據時代與民族學有關的著作二十多種為第一表，並把有關學者的學術活動繪成第二表藉以了解日本學人研究高山族的主要動態。初期的工作由東京人類學會推動，採用廣義的人類學調查方法，其採訪報告多載於該會雜誌上。高山族的舊慣調查為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的第二次事業(1909~19)，主要出版物有‘蕃族調查報告書’(8卷)、『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8卷)、『臺灣蕃族慣習研究’(8卷)等。臺北帝國大學的土俗人種研究室成立後高山族研究始有其學術研究中心。由其推動，研究者有文理工農醫等多方面的學人參加，使研究專門化，並有多方面的進展。學術上的重要論著多在此期產生。

此外，民族誌的出版是日據時的重要工作之一，自初期的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書開始，到後期的雅美族圖解民族誌，內容與體裁，都有嶄新的進展。高山族的分類工作也一向被重視，且有優越的表現。標本的搜集與陳列也是此期重要成就之一，現有的臺灣省立博物館與臺大標本陳列室都是在這時建立起來的。官方出版的統計文書，如‘蕃社戶口’、‘高砂族調查書’等都是研究臺灣土著社會的基本資料。

一

日據時期，日人研究臺灣高山族的情形，國人在“臺灣風土”、“臺灣風物”或省縣文獻委員會的刊物上已做過不少的評介工作，如陳奇祿先生對舊慣調查會的事業(1951, 1974)，宋文薰先生對烏居龍藏、鹿野忠雄等學人業績的介紹(1952, 1955)，都是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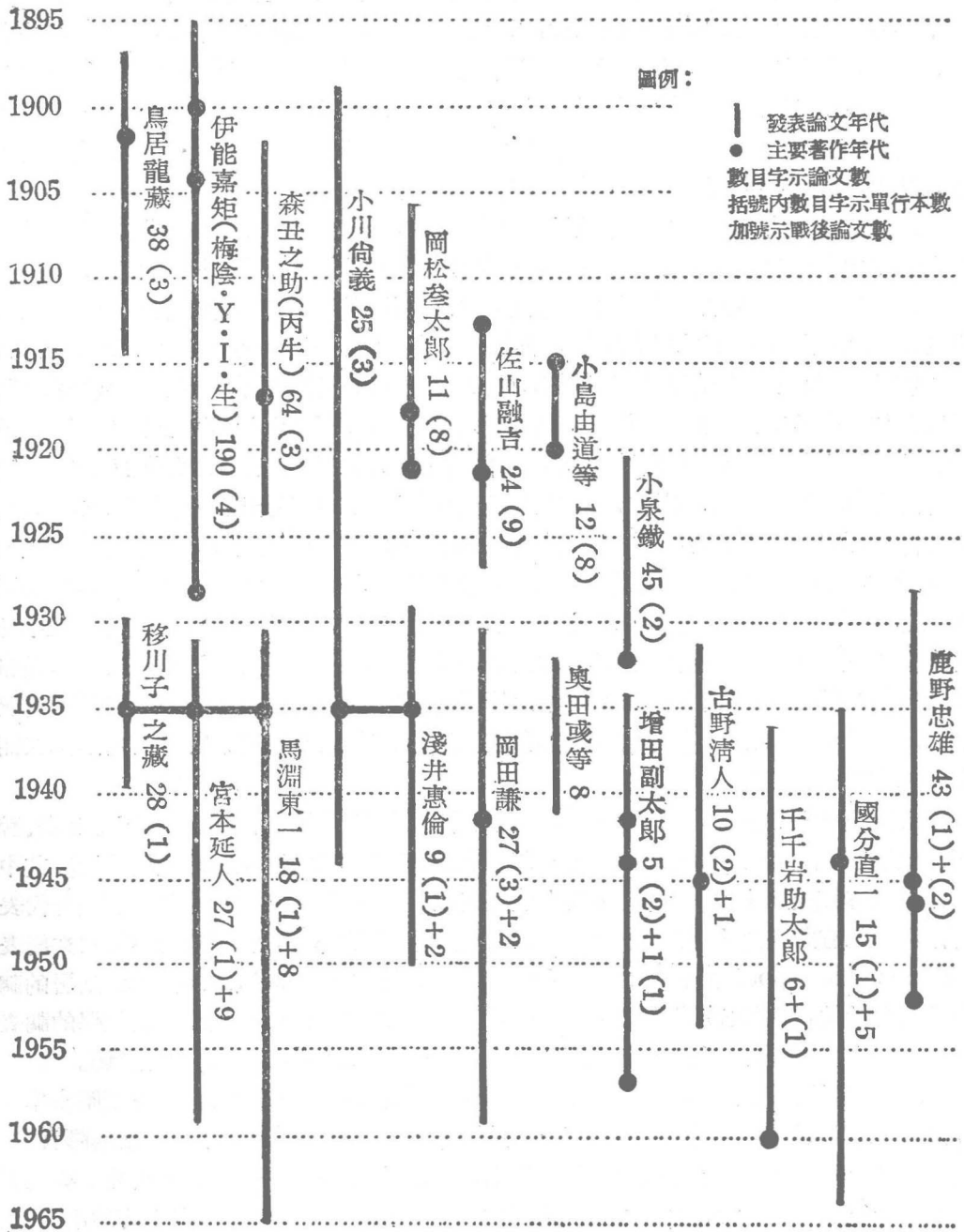
日本的學術界，也在“季刊民族學研究”第18卷第1-2期合刊上(1953)刊出“臺灣研究特集”，內有：高砂族的分類(馬淵東一)、語言學(淺井惠倫)、心理學(藤澤侂)、宗教生活(古野清人)、物質文化(宮本延人)、生業(瀨川孝吉)、先史考古學(金關丈夫、國分直一)、民族學(宮本延人)、社會人類學(馬淵東一)、體質人類學(金關丈夫)等諸部門；由專家來論述這一時期學術活動的經過以及其成果。最近“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29-30期合刊有吉原彌生女士編纂的“日文書刊所載有關臺灣土著論文目錄”(1967: 71-206)，收錄自1895年至1965年的70年間用日文發表的論文三千多篇。該目錄以族別及題別為分類的標準，使學者對這一時期的研究有完善的文獻目錄可利用，也從其有系統的分類中，可看出這一期間學術活動的一般方向及其趨勢。

今天，我們從其中選出與社會人類學或民族學有關的並在學術上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二十多種，按照發表年代的先後排列成一表；再以作者的學術活動，即各作者第一篇與最後一篇論文發表的年代用直線表示，其中出版重要著作之年用黑點表示，以製作第二表，做為大家了解過去日本學人研究高山族之主要動態的參考。

主 要 著 作 年 表

1900	伊能、栗野	臺灣蕃人事情
(1901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成立)
1902	鳥居龍藏	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書
1904	伊能嘉矩	臺灣蕃政志
1913-43	臺灣總督府	蕃社戶口
1913-21	佐山融吉	蕃族調查報告書 八卷
1915-20	小島由道等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八卷
1917	森丑之助	臺灣番族志 第一卷
1818-21	岡松參太郎	臺灣蕃族慣習研究 八卷
1928	伊能嘉矩	臺灣文化史誌 三卷
(1928		臺北帝國大學設立)
1933	小泉鐵	臺灣土俗誌
1935	移川、宮本、馬淵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 二卷
1935	小川、淺井	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
1936-39	臺灣總督府	高砂族調查書 六卷
1941	帝國學士院	高砂族慣習法語彙
1942	岡田謙	未開社會に於ける家族
1942	增田福太郎	南方民族の婚姻——高砂族の婚姻研究
1944	國分直一	壺を祀る村
1945	古野清人	高砂族の祭儀生活
1945	鹿野忠雄、瀨川孝吉	An Illustrated Ethnography of Formosan Aborigines, Vol., 1, The Yami.
1946-52	鹿野忠雄	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 二卷
1960	千千岩助太郎	臺灣高砂族の住家

日本學者之高山族研究著作年代表



二

廣義的人類學成立為獨立的一門學科，其時間大約在十九世紀的中期。此風東漸，到了1884年在日本成立東京人類學會，以東京大學的人類學教室為中心，定期舉辦學術討論會、田野調查、發行刊物，大力鼓吹斯學的研究。從此以後人類學研究的風氣在東瀛逐漸展開。自從乙未年清廷把臺灣割讓給日本以後，臺灣土著的人種、語言、體質、風俗習慣等，立刻成為該學會探討的主要對象之一，來臺會員的採訪通信錄，陸續刊登於該會雜誌上。初期的主要寄稿者有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丙牛)等人。

鳥居當時為東京大學的年青教員，前後來臺四次，歷盡跋山涉水之苦，首次遍訪前人未到的山地社會，從事廣汎的學術調查，奠定了臺灣土著人類學研究的基礎。

1896年7月，鳥居首次在臺灣東部從事田野工作。他從喜來、新城出發，一路翻山越嶺，經過卑南平原而到達知本溪，然後再渡過卑南大溪而抵達太平洋海岸，從此溯回喜來。其間歷時四個月，所調查的土著有泰雅、布農、阿美、卑南、平埔等族。次年(1897)10月底到12月底的兩個月間，再度來到東臺灣，調查臺東東南海面上的紅頭嶼(蘭嶼)，並命名該島的土著為 Yami 族。當他要離開的前十天，他的助手不幸因火傷而死亡，成為該島調查史上的第一個犧牲者。1898年在地學雜誌第116期發表的有關雅美族的人種論，實為有關臺灣土著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在同年的最後四個月中，他又舉行第三次的臺灣探險。這次的調查集中於臺灣東南部，即以排灣族為主，並經過火燒島(綠島)而回國。最後一次是1900年自1月至9月的九個月間，由南而北調查臺灣西部山地以及平地的土著。其中，曾從阿里山出發，經過前人未踏的路徑，探險玉山，爬上玉山山頂，穿過布農族居住區域，橫貫臺灣山地而到達東海岸，然後又在蘇澳、宜蘭進行調查，迴繞臺灣北端而回到臺北。繼而調查北部山地的泰雅族。鳥居的臺灣探險到此結束。再過兩年，又開始他那有名的苗族調查。

根據上述四次的探險，鳥居撰寫紅頭嶼、排灣、魯凱、卑南、阿眉、阿里山、布農、黠面、埔里社及平埔等九部報告，各部分成總說、地理編、體質編、言語編、雜事編等。其中付梓者只有紅頭嶼土俗一編(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書，1902)，成為鳥居此期調查的代表著作，也是有關臺灣土著的第一本民族誌。有關體質的部分，後來鳥居改用日文發表 'Etudes Anthropologiques: Les Aborigènes de Formose' (1910) 一文。鳥居的調查是綜合性的，包括民族學、體質人類學、語言學及考古學等，這種廣義的人類學的調查方法，成為當時在臺灣工作者的典範，對後繼者的田野工作，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1895年，伊能嘉矩和森丑之助(丙牛)兩人均以屬吏的身份來臺，前者主修歷史學而旁涉考古、人類學等，以臺灣歷史的研究為職志，後者原為隨軍旅的中國官話翻譯官，來臺後改學山地語言，兩者從不同的出發點，不期而遇的從事臺灣高山族的研究。臺灣從其地理位置而言，是屬於中國典型的邊疆地區，故其歷史是一篇漢人與土著的消長史。居住於西部平原的平埔族，在臺灣史上必然的扮演極重要的角色，自然的成為伊能主要研究對象之一。伊能的研究以文獻為主而以實地調查為輔，森即以高山族為直接的對

象，幾乎把大半的時間消磨在山地，成為當時最精通山地情況者。

1900年伊能和栗野傳之丞共著的‘臺灣蕃人事情’出版，這是兩人受當時的總督府民政長官之託而花了半年多的時間所做的實地調查報告，依據語言、風俗習慣異同的觀察，把臺灣土著分成 Ataiyal, Vonum, Tsou, Supayowan, Tsarisen, Piyuma, Amis 及 Peipo 的八個種族，又把平埔再細分十小羣，即 Tatsuo (Makatao), Siraya, Lloa, Poavosa, Arikun, Vupuran, Pazzohe, Taokas, Ketanganan 及 Kuvalan 諸族。至於賽夏族，伊能、栗野兩人認其為平埔族 Taokas 小羣之分支，稱為 Amtura，後改稱 Saisiety, 未給獨立的地位。有關臺灣高山族的分類，由於鳥居、伊能、栗野三人的努力，其基礎可以說到此略具規模。

至於官方所採用的分類法，1911年總督府蕃務本署發行的 *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 一書，參照上述諸人的調查結果，分成 Taiyal, Bunun, Tsou, Tsarisen, Paiwan, Piyuma, Ami, Yami 及從來被視為平埔族之一支的 Saisiety 為九族。另一方面，森丙牛在1912年三省堂發行的‘日本百科辭典’第六卷上發表 Taiyal, Bunun, Tsou, Paiwan, Ami, Yami 的六分法，即把 Tsarisen, Piyuma 及 Paiwan 合併為一族。自1913年，總督府刊行的‘番社戶口’採用森的分類再加 Saisiety 的七族分類法。

伊能是一位甚勤於寫作的學人，雖然他的工作以文獻為主，但他在臺的十年，時常四出採訪，故有關土著的報導甚衆，總數將近二百篇。尤其他考證文獻而所得的有關平埔族的歷史記錄，成為他在1904年出版的‘臺灣蕃政誌’及1928年出版的巨著‘臺灣文化志’等歷史著作的骨幹。當時的平埔族還沒有完全漢化，仍保存其固有語言及其習俗，故此期伊能的調查報告，在其固有文化完全消滅的今天看來，都是珍貴的資料。

三

日據初期官方機構對高山族研究的推進有決定性的影響力的，為在臺灣總督府內成立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是由統治上的需要所設立者。當時日本的法律思潮在歐洲大陸歷史學派的影響下，認為法律和生活之間不能有所脫節，否則無法有效的推行，乃有‘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設立之議。1899年臺灣總督府聘請京都大學教授岡松參太郎等開始計畫臺灣固有習慣的調查，翌年2月着手工作，同年11月刊行‘臺灣舊慣制度調查一斑’，1901年4月舊慣會成立。成立之初設立二部，第一部以調查有關法制的固有習慣為主要工作，第二部以調查有關農工商經濟的固有習慣為其主要工作，前者以岡松任部長。舊慣會蒐集的資料逐年出版，有‘臺灣慣習記事’、‘臺灣私法’二十餘冊(1903-11)、『清國行政法’八冊(1905-15)、『經濟資料報告書’二冊(1905)等之刊行。

到了1909年第一部因法制的調查事業近於完成，該部乃設立蕃族科，着手高山族固有習慣的調查。高山族的調查雖為法制部的第二次事業，但其調查範圍不限於有關法制的固有習慣，舉凡衣食住、生產方式、宗教信仰等均予調查。因為他們以為要知悉其固有習慣，應同時充分了解其生活情況。

舊慣會蕃族科的工作人員，據‘臺灣舊慣調查事業報告’有36人之多，計補助委員4人（小島由道、平井又八、河野喜六、佐山融吉）、囑託30人，雇員2人（安原信三、小林保祥）。其囑託多為公職人員兼職，在任期間均非常短暫，所以實際工作人員實不能算多，但他們竟有二十餘冊的報告和論著的出版，其成績可謂斐然。該會刊行的有關高山族的圖書有：

蕃族調查報告書 全八冊 佐山融吉著

阿眉族南勢蕃馬蘭社卑南族卑南社 1913年

阿眉族奇密社馬太鞍社太巴塢社海岸蕃 1914年

曹族阿里山蕃四社蕃簡仔霧蕃 1915年

紗績族霧社蕃韜佗蕃卓犖蕃太魯閣蕃韜賽蕃木瓜蕃 1917年

大ㄟ族前編：大崙坎蕃合歡蕃馬利古灣蕃北勢蕃南勢蕃白狗蕃司加耶武蕃沙拉

茅蕃萬大蕃眉原蕃南澳蕃溪頭蕃 1918年

武崙族前編：巒蕃達啓寬加蕃丹蕃羣蕃干卓萬蕃卓社蕃 1919年

大ㄟ族後篇：加拉歹蕃含加路蕃巴思誇蘭蕃鹿場蕃汶山蕃大湖蕃屈尺蕃哥拿餌蕃 1920年

排灣族、獅設族 1921年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全八冊

第一卷〔泰雅族〕 小島由道、安原信三 1915年

第二卷〔阿美族、卑南族〕 河野喜六 1915年

第三卷〔賽夏族〕 小島、安原 1917年

第四卷〔鄒族〕 小島、河野 1918年

第五卷之一〔排灣族〕 小島、安原、小林 1920年

第五卷之二 欠

第五卷之三〔排灣族〕 小島、小林 1922年

第五卷之四〔排灣族〕 小島、小林 1921年

第五卷之五〔排灣族〕 小島、小林 1920年

以上兩種是舊慣調查會的實地調查記錄。當時所謂的“番害”仍熾，例如由補助委員之一的平井又八在馬太安調查時遭七脚川社人的出草被戕首而殉職，可見其一斑。因此舊慣調查會調查的地域反應着當時治安的實況，有許多地區因“番情不穩”或“未歸順”使其調查無法進行或者草草了之。蕃族調查報告書和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正如其書名所示，內容前者偏重於物質文化和生活習慣方面，後者則偏重於社會組織和親屬關係方面。

臺灣番族慣習研究 全八卷 岡松參太郎著

全卷分番族概況，父系之義、母系之義，和親族、家族、家族制、婚姻制三編。第一卷至第四卷為第一編；第五卷為第二編；第六卷至第八卷為第三編。

作者是舊慣調查會法制部的主持人，受教於德國比較法學泰斗 Kohler 教授，認為原始社會的慣習法實為法制史與社會史不可忽視之貴重材料，有供解決千古疑問之價值。該論著的精華在第二編。第三編是第一編與第二編的補充。

該會出版的圖書還有森丙牛所著的‘臺灣蕃族志’（1917）一卷及‘臺灣蕃族圖譜’（1918）二卷等。森原計畫出版蕃族志十卷，他在臺灣蕃族志第一卷的凡例裏說：

“本志為據總括調查臺灣蕃族之結果所編修之記錄，第一卷記述大叻族，第二卷以下則記述武崙族、曹族、排灣族、阿眉族、雅美族及平埔蕃，另輯錄以上各族的體質人類學研究，考古學探究所得之先史狀態、蕃語、及全卷索引，全十卷。”

由於他的投海自殺或海上失蹤（據說是1923年的關東大震災把稿件燒失而深受打擊所致，或說因與上司不睦而起厭世感），而使他的壯志沒有實現。森的足跡遍及全島山地，特別通曉於泰雅、布農兩族的語言及土俗，我們今天只能透過他所留下的蕃族志一卷，來窺見他對臺灣土著研究的一端。又，總督府博物館成立後，他為該館搜集高山族土俗標本，奠定其規模，其功也是不可沒的。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事實上在1919年解體，以後由‘蕃族調查會’來代行出版事宜。關於舊慣調查會的工作在學術史上的意義，誠如馬淵東一教授所指出，在當時各國政府的事業中，只有荷蘭政府的‘慣習法集成’ Adatrechtbundel 可以匹敵，兩者均以提供殖民地官員參考資料為目的。荷蘭的‘慣習法集成’以未刊報告的刊行乃至摘錄既刊書中的精華為主，日本即以舊慣調查為主，不過日本的事業只有短暫的生命，無法培養出傑出的學人而促使該會成為學術研究之中心。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解散以後到臺北帝國大學成立的一段時間，高山族的調查研究趨於低潮。此間的代表學人為小泉鐵。他是法科的出身，自1925年至1928年之間數度來臺從事社會組織的調查，採訪東海岸諸族的年齡階級組織及北部山地泰雅族的社會制度。主要的著作有‘蕃鄉風物記’（1932）、‘臺灣土俗誌’（1933）等，但這些都是紀行體的調查報告書。他雖有出版純理論性的研究報告的企圖，但未曾實現。

此外，有安藤喜一郎的泰雅、布農兩族特定部落的研究，著有‘在高峰的家族與社會’（1930）一文，試圖比較研究兩族間的社會形態以及生活態度。當時文化形態論還在萌芽時期，安藤的嘗試是富有學術史上的意義。不過他不久就離開學術界而轉入商界，其學術發展遂告中斷。

四

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給臺灣土著的研究，帶來了嶄新的局面。設有南方研究的特殊講座為該大學的特色，單在文科即有土俗人種學、南洋史、印尼比較語言學等講座，從此可窺見該大學陣容的一斑。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是以臺灣土著文化為主要對象，做理論性探討的學術機構，其陣容由主任移川子之藏教授及助手宮本延人兩人所組成。該教室培養出來的學者只有馬淵東一一人，事實上該研究室的研究是由他們三人協力而進行的。“南方土俗”是該研究室發行的學術雜誌，一共出版了六卷（1931-42），每卷

四期，最後一卷改名為‘南方民族’。1930年以後的三年為該研究室最活躍的時期，該研究室和語言學研究室共同接受前總督上山滿之進所贈送的高山族研究補助費，舉行長期的田野調查，1935年同時出版‘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及‘原語高砂族傳說集’二書，前者是土俗人種研究室三人合作的成果，後者是由語言研究室的小川尙義和淺井惠倫兩人合作而成，由其卓越的學術貢獻，各獲得當年的日本學術最高的學士院賞及恩賜賞。兩書之中，傳說集是純語言學的著作，我們在此，只對前者的內容，作簡略的介紹。

在臺灣土著的各村落裏，傳誦着極豐富的神話傳說。在土著的歷史知識裏，神話は歷史中極重要的一部，與特定家族（司祭家或頭目家等）或氏族的起源及其社會地位的決定、部族或部落間的親緣關係，土地的佔有、使用的權利義務等都有密切的關係。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是着眼於這些事實，以各社的口傳，尤其是所傳承的系譜知識為線索，探討土著氏族、部落的遷移、分歧、混淆的過程，重構泰雅、賽夏、布農、鄒、魯凱、排灣、卑南、阿美、雅美九族以遷移為中心之歷史的大著。該書分成二卷，即由本篇及資料篇二部所構成，資料篇收錄309條系譜及四張系統別部落分布圖所成。在本篇，首先探討系譜傳承對系統識別上的意義，部族或部落的血緣及地緣關係，氏族制、姓名制、家名制的存在及其功能，發祥地傳說中以高山、平地或海岸為故地和海外傳來說等三種類型及自故地向外發展的過程，分成離心的及向心的兩種說明。本文分成九章，根據上述的大綱，族別的細述各社間或特定地域內的分派、遷移的統屬關係。該書根據實地調查所收集的龐大的系譜資料及有關的神話傳說而有系統的敘述以外，對布農、鄒的氏族制度的闡明，大中小各級的組織及其功能，有關狩獵、耕作、祭祀、外婚諸規定的詳細說明，實是對臺灣土著社會組織研究的一大貢獻。

對無文字民族之歷史的復原，是一件至難的工程。該民族的歷史行程，不但投影於口傳的神話傳說上，也同樣的投影於其體質、語言、文化等諸特質的形成上，故對這些特質的探討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同時，過去該民族和文明民族的接觸而由後者所留下來的文獻記錄，及從地下出土的考古資料，同樣構成重建歷史的重要資料。在過去漫長的時間裏，臺灣土著的祖先，何時何地，帶着何種文化，由何種路線來到臺灣，此後經過何種涵化的過程，產生現在的土著各族？雖然系統所屬的研究還不能答復這些問題，但該書把土著的龐大的口傳歷史知識記錄下來，且忠於資料而建立土著水準的歷史模式，奠定臺灣土著歷史研究的基礎。

土俗人種研究室這種偏重歷史性的研究，與該研究室的主任移川教授的學風有關。他受業於美國哈佛大學 Dixon 教授，染有濃厚的歷史學派的色彩。但自二十年代的後半，功能學派的學風自英國逐漸傳開，這種新的學潮對年青一代的學人將有決定性的影響。系譜方法原是社會人類學者研究原始社會組織的不二法寶，自1930年用該法在泰雅、布農、鄒、魯凱、排灣、卑南、阿美諸族之間廣汎的收集有關系統所屬研究之資料的馬淵東一，漸漸的被布農、鄒兩族的社會組織所吸引，並從零碎的系譜資料上發見布農、鄒兩族的親屬稱謂有類似 Omaha 型的用法及母方氏族有靈力優越的特殊現象。

當時 Margaret Mead 在 Admiralty 諸島的調查 (Kinship in the Admir-

alty Islands, 1934, Chicago) 發現該地土著在父系社會的建構下，親屬稱謂屬於 Crow 型的事實，這與當時以 Lowie 為代表的 Omaha 型與父系社會、Crow 型與母系社會有相關關係的學說不合，遂着眼於土著的宗教信仰，即表現姊妹及其女系親屬對兄弟及其男系親屬有靈魂力量優越的種種宗教儀禮來解釋在父系社會裏產生 Crow 型親屬稱謂的原由。由於 Mead 論文的啓發，馬淵發現親屬儀禮中的靈力的優越性有馬來型及大洋洲型兩種。

自1935年以後，馬淵的田野工作集中於布農、鄒兩族，對兩族父系社會中母族的地位開始做廣汎而深入的調查研究。此期的重要論文有：‘布農、鄒兩族的氏族組織及婚姻規定’（1934）、‘布農、鄒兩族的親族名稱（其一）’（1934）、‘布農族的祭與曆’（1936）、‘中部高砂族的祭團’（1937）、‘中部高砂族父系制中的母族的地位’（1938）、‘布農族的獸肉分配與贈與’（1940）等。後來馬淵把實地調查的範圍擴及到印尼，戰後又在琉球繼續不斷的追求同一問題，並透過通文化比較研究的方法，發展其理論。近年來，這一方面的重要論著有：“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Central Tribes of Formosa”（1952, *Internationales Archiv für Ethnographie*, Band 46, Heft 2, Leiden, Holland）, “The Importance of Maternal Relatives under the Patriliney among the Central Tribes of Formosa”（1953, *Proceedings of the VII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New Zealand）, “沖繩先島的 Onari 神”（1955, 日本民俗學第2卷第4號及第3卷第1號）, “The Two Types of Kinship Rituals among Malayo-Polynesian Peoples”（1958, *Proceedings of the IX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Tokyo & Kyoto）, “Spiritual Predominance of the Sister.”（1964, in A. H. Smith (ed.) *Studies of Ryukyuan Culture and Society*, Univ. of Hawaii Press）, “圍繞 Onari 神的類比與對比”（1968, “日本民族與南文化”——金關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 “A Trend toward the Omaha Type in the Bunun Kinship Terminology”（1970, in the *Echanges et Communications, Mélanges offerts à Claude Lévi-Strauss à l'occasion de son 60ème anniversaire*, ed. by Pouillon, Jean & Pierre Maranda. The Hague.）, “Magico-Religious Land Ownership in Central Formosa and South-east Asia”（1971,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29期）。

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另一特色，是建立一所以研究為目的的土俗標本室。聽說，開始以伊能嘉矩的蒐藏品做為起點，每年撥有專款專供收集標本之用，到了日本統治的末期，所藏標本已達萬餘件，主持收集標本事宜者為宮本延人，其足跡遍及山地所有部落，對該研究室標本室的經營頗盡綿力。

總督府博物館的土著標本的蒐集，森丑之助之後有尾崎秀真等繼承，所藏的標本共達數千。此外佐久間財團透過山地駐在所所收集的土俗品，也有相當的數目，後來這些標本也歸屬於總督府博物館。

以上兩所博物館的標本合在一起，有關高山族的土俗標本，大致可以說是相當齊全

的。

語言學研究室的研究，除了上述的‘原語高砂族傳說集’以外，小川尙義對山胞語言的研究開始甚早。他對山地語辭典的編纂有特殊的貢獻。有‘泰雅語集’（1931）、‘阿美語集’（1933）、‘排灣語集’（1930）自總督府理蕃課出版，採用國際音標符號，語彙豐富與解釋的正確，對山地語言的研究，有所貢獻。

五

在大學裏，雖然不以高山族的研究為主要對象，但其研究領域常常涉及高山族的學科，除了語言學教室以外，還有社會學、心理學、解剖學、農業研究等諸研究室。

在社會學研究室講授農業社會的岡田謙，對社會人類學也具有濃厚的興趣。從他所發表的論文的數量來看，有關研究高山族社會組織的論文遠超過研究臺灣農村社會者。他在學理上比較傾向於功能學派中 Radcliffe-Brown 的學說，方法論上即應用他所熟悉的研討農業社會而發展出來的一套調查、統計及分析方法，來探討臺灣高山族的社會組織，尤其是家族的組織結構。他所調查過的族羣有鄒、泰雅、布農、排灣、阿美等，‘未開社會的家族’（1942）一書為其研究成果之一。岡田對每一族選一個部落作代表，作二週乃至三週時間的田野工作，搜集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資料，同時他也善於利用官方的資料，並見長於資料的統計處理，他認為家族是共同生活而來的同一體感或合一感所支配的社會集團，是故以社會制度的探討為目標的社會人類學的研究方向或有不一致處。但無論如何，他的嘗試在社會人類學的領域裏重新引導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進來，擴張原始社會家族研究的領域，實是他的貢獻。

在農業經濟研究室講授農業法律的增田福太郎副教授，潛心於漢族宗教的研究，後來對高山族的文化發生興趣，作數次短暫的山地調查，出版‘南方民族的婚姻’（1942）、‘原始刑法的探討’（1944）等書。前一書的副題為“高砂族的婚姻研究”，書中散見他用高山族的例子來反駁十九世紀社會進化論派理論，這也許是在進化論色彩極濃厚的比較法學的環境所使然。該書的重點放在賽夏、布農及鄒族等的氏族制度及婚姻制度，尤其是對一向缺乏正確調查資料的賽夏族提供了有益的資料。戰後尚有“在未開化社會的法制形成”（1957）一書由岡山大學法經學會出版。

該研究室在主任奧田或教授的領導下，對高山族的農業經濟，也做過若干的實地調查。奧田是研究日本農村土地制度的權威，他對高山族的土地制度也有濃厚的興趣，但臺灣農村經濟為其主要研究對象，因之無法傾全力於高山族土地制度的研究。該教室在這一方面的成績有“臺灣蕃人的燒田農業”（1933）、“紅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1939）、“紅頭嶼雅美族的勞動與漁撈”（1939）、“紅頭嶼雅美族的財產制”（1941）、“紅頭嶼雅美族的農業”（1941）等數篇論文。“燒田”（游耕）農業是以農業技術為中心的記述，其餘都是雅美族的調查報告，其中的社會組織是日據期間唯一以雅美社會關係為基礎的報告。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千千岩助太郎在日本學術振興會的資助下，作一連串的高山族住屋的建築學研究。其成果連續發表於‘臺灣建築會雜誌’（1937-1942）上。戰後彙